

中共構建「和諧世界」的戰略意涵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 — from Neo-Liberalism Perspectives

胡敏遠 博士 (Ming-Yuan, Hu)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藉由「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中共「和諧世界」的概念與其戰略意涵，以期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與目的。中共十七大後，「和諧世界」的概念成為對外政策的基調，其戰略意圖有四：第一、建立具有吸引他國的制度；第二、審慎處理大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第三、營造有利於其經濟發展的客觀環境；第四、安定內部政治勢力的雜音。「和諧世界」的概念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雖多處相通，但結合了中共的「新安全觀」及企圖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等觀念，僅能稱其為中共對外在安全環境的建立與外交事務的策略運用。所以，從中共對外行為而論，「和諧世界」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手段；是達到其國家利益的目標，是要推銷一套中國式（國際關係理論）的意識形態。

關鍵詞：和諧世界、新自由制度主義、囚徒困境、中共外交政策

Abstract

This study approaches the “Harmonious World” concept proposed by China and analyzes it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rom Neo-Liberalism perspectives, to explore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and objectives. After China's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Harmonious World” concept has become the baseline of its foreign policy.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this concept include: first, building an attractive system to other countries; second, conscious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rd, building a external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rth, eliminating the noise in the domestic politics. The “Harmonious World” concept is in many ways consistent with Neo-Liberalism. However, taking into account China's “New Security Perspective” and its intention to establish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we can only regard this idea as China's efforts to shap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trategic applications to foreign policy. Therefore, the concept is, at best, a strategic approach that China uses to see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manage its foreign affair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from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we see “Harmonious World” as a foreign policy means that China use to reach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omote a Chinese-style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Keywords: harmonious world, Neo-Liberalism, Prisoner's Dilemma, China's foreign policy

壹、前言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大陸官方及學界普遍的認知；當前國際情勢正由「一超（美國）多極」向「多極化」的世界發展。¹在未來世界局勢發展中，各國間相互依賴將日益重要。大陸學者王逸舟甚至認為，未來的國際體系之中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國際法都將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的地位。²因此，中共在未來的國際環境中應會採取多邊主義的策略，並會重視大國之間的合作與孕育國際體系與國際組織的調整，以發展有利於「中國崛起」後的國際新局勢。

2005年9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大會上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³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⁴無疑地，「和諧世界」的理念及策略的提出，是在反映中共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世界觀與安全觀，並確認其為中共對外工作的重要目標。

中共自十七大以後，大力推動推廣「和諧世界」的概念，對中共外交政策來說，是

一項重大的創新與學習的過程。所謂學習與創新，用國際政治的用語，為外交與國際事務將會發生觀念和認知的改變。此種改變會帶來政策的變化，完善對於世界的認識，或使決策者的思維結構變得比較複雜及靈活。⁵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視野來看，中共「和諧世界」的提出，是想跳脫冷戰時期「新現實主義」的對抗思維，企圖擴大與運用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同時以「和諧」作為宣傳的軟實力，企圖達成其「崛起」而不會遭受國際的質疑與大國的遏制。上述概念與新自由主義理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本文藉由「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中共「和諧世界」的概念與其戰略意涵，以期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與目的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希望藉由中共外交的目標與理念的追尋，以檢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否能解釋中共的國際行為。

貳、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概述

本文概述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以國際關係第三次大辯論為主要論點，其中重要觀點如下：

一、「新自由主義」的源起與概念

1 詳閱：閻學通，〈評冷戰後經濟全球化的政治影響〉，《國際經濟評論》，1998年10月，頁28-30。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頁196。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884098.htm。

2 王逸舟，〈多極化不等於反美〉，《環球時報》，1999年8月16日，版14。

3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版1。

4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5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2, Spring 1994, p.283.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以批判現實主義(Realism)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過程中壯大起來。⁶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相同的假設：國際社會處在一個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的認同與利益是固定的，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會影響國家的行為，對國家而言認同與利益都是理性的，國家的行為都是為擴大預期的效益。⁷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也是承襲著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潮，演進過程又與國際合作、國際制度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新自由主義非常強調國際合作的發展，尤其重視國際制度的建立，他們將國際合作與國際制度視為一體的關係。⁸新自由制度主義實際上是探討國際合作與制度的形成。

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主要論點

(一)國際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下，每個行動體在以利己的國家利益做為考慮的背景下，會產生出很多的問題，而且很容易出現「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現象，國家必須根據他們的狹隘理性去選擇他們的外交政策，因而很容易陷入衝突或合作的二分法之中。國際社會需

要用制度來降低誤判與欺騙，才不會因為在資訊不足下，出現「囚徒困境」的景況。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相信國際社會的成員均具有理性與功利至上的能力(a rational utility-maximizer)，對外行為即是要追求國家的利益為依歸。⁹新自由制度主義通過假定理性的個體僅僅思考個體主義中的國家利益，即會出現影響合作的主要因素主要來自於欺詐的行為。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使國家承諾可以解決囚徒困境的條件為：第一，重複博弈，他們相信只要重複執行博弈，國際之間的合作就很容易實現；第二，合作伙伴國的數量。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在國際合作的環境中，愈少的參與者則制度的形成愈容易；第三、國際事務的連繫。必須通過多層次的博弈，並不斷進行討價還價的過程，才有助於合作的實現。¹⁰

此外，「絕對利得」是新自由主義一貫的主張。因為，各國所關心的是他們國家的絕對利益，因而也不會關心其他國家到底可以獲得多少利益，同時他們也不會關心合作是否會導致相對利益的損失。¹¹他們認為，國際之間道德與合作無關，不應以價值規範

6 基歐漢承認，他的自由制度主義觀點就是從新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借鑑過來的。詳閱，大衛·鮑德溫(David A. Baldwin)主編，肖歡容譯，〈譯者序〉，《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3。

7 John Gerard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9.

8 約瑟夫·格里格(Joseph Grieco)著，肖歡容譯，〈無政府狀態和合作的限度：對最近自由制度主義的現實主義評論〉，《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131-134。

9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

10 大衛·鮑德溫主編，肖歡容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83-117。

11 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著，肖歡容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絕對利得與相對獲益〉，《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228-229。

加其上，國家間乃基於互惠利益(reciprocity)而非單純為道德聲譽(reputation)來進行合作，而衝突的情況也同時並存於國際社會之中，同時國家間乃基於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而非相對獲利(relative gains)以進行合作。¹²

(二)國際制度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從制度的功能來分析與解釋制度如何的形成，制度的功能即是要解釋制度的成因，制度的存在是為了要增進共同利益，降低交易成本，使行為者通過合作能獲得更大的利益。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制度的作用，他們認為有效的國際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制度是國際穩定的主因；第二，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第三，制度可通過國內制度以改變偏好，國際安排改變社會集團的權力、信仰和目標並改變了它們對外的政策，限制了國家主權以及其偏好和價值方面。¹³

(三)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理論說明

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奈伊(Joseph Nye Jr.)指出，相互依存的概念預示著世界性質已經發生變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

賴」是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之間的行為體之間，以相互影響為特徵的情形。¹⁴其次，基歐漢和奈伊發展了國際關係中出現的「複合相互依存關係」理論，並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種權力形式加以模型化，然後將其運用於現實層面，以推導出問題領域的權力結構模式。他們認為，不同行為體和不同環境的權力關係，並不能用同一種模式來進行比擬，同樣的在不同的權力領域中，所出現的問題也會不同，所以有必要制定不同的制度與規則，來解決不同地區的不同問題。¹⁵

新自由制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崛起，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重要的主流學派，儘管新自由制度主義大師仍宣稱該理論具有不少缺點，¹⁶但它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意義卻非常重要。

參、「和諧世界」的概念與中共的戰略意圖

中共十七大後，「和諧世界」的概念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基調。¹⁷然而，「和諧世界」的內容及其具體的實踐目標為何？中共

12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17-20.

13 Andreas Hasenclever, and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8-120.

14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 Jr.)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

15 載於劉武通，〈從結構理論反結構決定論—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評析〉，《歐洲月刊》，1999年第1期，頁30。

16 蘇長和，「譯序—中文版前言」，載於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頁21-26。

17 「和諧世界」是2005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慶祝60週年大會上提出的概念，這項政策或理念並不明確。由於這完全是胡錦濤個人的意見，因此在2012年第五代領導人接班之前，和諧世界將會成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核心。See, Bonnie Glaster, "Ensuring the 'Go Abroad Policy' Serve China's Domestic Priorities,"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 7, No. 5 March 8, 2007.

的戰略意圖是用它作為對抗大國的工具，抑或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口號？推廣過程中，中共的國家利益又為何？上述問題都會與中共的國際行為產生密切關聯，分析如後：

一、「和諧世界」的概念—為中共對外在環境的一種建構

中共認為當前世界體系正處於從「一超多極」向「多極化」世界的轉變之中，採取多邊主義政策較適合中共當前的外交處境。¹⁸中共始終認為，美國在亞洲地區仍是要樹立霸權地位，甚至要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新秩序。¹⁹在亞太地區，中共早已視美國為主要的、潛在的假想敵，²⁰如何防止美國的霸權作風，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思考。中共未來勢必會不斷推動其建軍工作，以達成反制美國的遏制作用。²¹其次，中共現正設法排除外在的威脅，並營造一個有利於其經濟發展的環境，才能繼續創造經濟發展的榮景。最後，當前全球正遭逢天然災害與國際犯罪等非傳統安全之害，因此防範溫室效益、環境污染、糧食短缺，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等的議題，已成為全球各國安全發展的共識。中共當然會重視上述非傳

統安全議題，可能對其帶來的負面效益。

美國蘭德(Rand)公司研究員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認為中共的國際行為乃因對國際環境新的認知後，所採取的必然措施。他認為中共對安全環境的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六項：不會發生大國戰爭、全球化會加深國與國之間的互賴關係、國際格局正朝向多極化目標、非傳統安全的新挑戰、能源的危機意識、「中國威脅論」對中共在國際上的影響等。²²上述六項認知可說是中共的國際觀與安全觀的建構，中共也依此策訂其在各個領域的政策與行動準據。

中共以「和諧世界」為其外交發展方向。在政治上，藉由積極地參與各個區域的多邊機溝，加深戰略夥伴關係與戰略對話活動。在經濟方面，除不斷簽署雙邊貿易外，也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金融協定、發展援助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俾促進政治目標的達成。在軍事方面，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高層軍方人員交流、聯合軍演，其目的是要為了向其他國家進行安全的保證。²³所以，「和諧世界」的概念與政策，正顯現出中共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一種認知及反映，實

18 杰弗里·帕克(Jeffery Park)認為，在多極化格局的世界體系，會出現多重權力中心，多重中心的存在是21世紀的發展趨勢。詳見，杰弗里·帕克著，《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與未來》（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7月），頁177。

19 馬建新，〈論和諧世界的哲學意涵〉，載於張蘊嶺主編《構建和諧世界：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頁21。

20 依據中共國防白皮書《2004年中國的國防》所述：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複雜因素不斷增加，美國重組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強化軍事同盟關係，加速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中共認為，美國增強軍力部署和強化其在東亞與中亞各國的聯盟關係就是針對中共以防杜其崛起成為區域或全球的大國。詳見，《2004年中國的國防》，新華網，2004年11月27日。

21 岳飛(Ellis Joffe)著，〈共軍的「應有規模」為達何種目的？〉，載於甘浩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w Scobell)編，《解讀共軍兵力規模》(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臺北：國防部編譯，2010年8月），頁424。

22 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頁15-16。

23 同註22，頁17。

際上也是一種建構主義的理念。

二、「和諧世界」與新安全觀的連結與實踐

事實上，中共和諧世界的安全觀是延續1997年以來其所闡述「新安全觀」的論點。中共指出「世界各國應摒棄冷戰思維，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運用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衝突和戰爭，同時也須通過合作降低恐怖主義活動、金融風險、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威脅，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²⁴英國學者Rosemary Foot認為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主要目標是要使大陸的鄰近國家都相信「中共崛起」將是和平的，不會擾亂地區與全球的秩序。²⁵確切地說，中共想要以平等互利的方式推進大國之間的對話和合作，同時也希望能夠降低鄰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恐懼。因此，中共會強調「不尋求在該地區的任何排外性質的戰略利益，也不希望排除與地區有關的其他國家的合法存在和利益。」²⁶從世界秩序的視野來看，中共和諧世界的理念是要推展新的世界秩序，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能持久和平，又能與中國大陸共同繁榮的和諧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共敞開大門推展「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之時，美國的態度的否會造成中共對外態度的轉變。長期以來，中共都以抗衡的心態視美國為一個霸權國家，而中共主張推動國際新秩序，其中的

重要意涵即是在對抗由美國所主導並建立的世界秩序。中共強調和諧世界的安全觀，要以對話合作方式來替代對抗，都可看出中共欲用「和諧世界」的安全觀，以對抗「美國霸權」的企圖。

三、「和諧世界」為國際體系下的策略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會以其國力的實際狀況，在面對不同的國際體系下提出不同的策略以因應之。隨著中共各項國力不斷崛起的影響下，中共已清楚地認識自己正面臨著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共以為，崛起國家需要審慎處理自己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係，而且必須認識到是否會對現存的大國帶來威脅。²⁷事實上，中共的綜合國力雖不斷的向上提升，但與美國相較其實力仍有一大段落差，尤其中美之間在貿易上存有極大的差距，美國也不斷利用各種手段逼迫中共人民幣升值，免除對中共外貿政策上的優惠等，這些都是美國為因應「中共崛起」過程所採取的遏制措施。所以，中共在因應其崛起過程之中，必須採取謹慎適度的外交戰略，更須處理好和美國的關係，才能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致遭到外在環境的威脅與挑戰。

另外，中共提出「和諧世界」有另外一層的戰略思考。和諧世界須面對不同的不和諧狀況，例如如何解決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以及如何防範地區衝突、能源短缺、恐怖主義、國際犯罪等問題，都

24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載於2006年《國際形勢年鑒》（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555-556。

25 Rosemary Foot,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Order: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orld' ",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March 2, 2007, p.6.

26 中共在2006年提交給東協地區論壇《對安全的年度看法》，詳閱周琪，〈和諧世界理念與中美關係〉，載於張蘊嶺主編，《構建和諧世界：理論與實踐》，頁99。

27 賈慶國，〈機遇與挑戰：單極世界與中國的和平發展〉，載於王輯思主編，《北大國際論叢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頁41。

屬於創造和諧世界的內容。基此，通過建構「和諧世界」的理想，中共在對外策略的選擇上可保有較大的彈性，也可減少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憂慮。

四、「和諧世界」具軟實力（意識形態）的功能

胡錦濤在聯合國60週年會議上強調：「我們要摒棄冷戰思維，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建立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衝突和戰爭，維護世界和平。」²⁸中共強調唯有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和制度的普遍性、規則性和凝結性，才能促進國際社會保持和平共存、和諧共處的秩序狀態。²⁹不可否認，和諧世界是指導中共外交政策的新方針，儘管它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論，但以此作為國際戰略的思路，它已明顯具備推展中國軟實力的資格。因為，多年來中共不斷地創造「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新安全觀」等國際政治的新概念，明顯地中共企圖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推展屬於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新理論建設實際上是在國際關係知識領域中爭奪「話語權」，亦是爭奪意識形態的權力。從和諧世界的知識觀點出發，雖然其與新自由主義的論點相類似，但更多中國話語的出現，有利於中共在國際政治推展其意識形態，有利於中共追求國際戰略目標與核心價值，更具有普世

價值的意涵。

五、小結

中共對「和諧世界」的解釋為，世界各國應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包容差異（包括國家政治體制和價值觀），並且以公平分配經濟利益的原則推動國家發展。³⁰但是，從前述各項因素的分析得知，「和諧世界」的概念實際上會隨時間的演進，將以不同的方式見諸在中共的對外政策上。大致而言，和諧世界僅是一個概念性的議題而非為嚴謹的理論，此一概念包含了兩個層面：第一，和諧世界觀意味著中共領導人將不再以反動好戰的傳統看待國際事務，反而會強調要與國際社會保持緊密的接軌；³¹第二，和諧世界是為中共經濟發展或其大國外交戰略創造一個有利的客觀外在環境，以使中共涉外政策，具備更佳的協調功能。

就實情而言，建構「和諧世界」是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具體實踐，其戰略意圖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四個目標：第一、建立具有吸引他國的制度，以完善自己具有的實力；第二、審慎處理大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第三、營造有利於其經濟發展的客觀環境；第四、安定內部政治勢力的雜音。正如中共決策者數十年來反覆重申的內容，中共試圖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為國內持續改革及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³²可見，「和諧

28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版1。

29 〈中國東盟攻略：2500億打造周邊和睦鄰戰略安全〉，《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北京），2004年11月25日，<http://news.sohu.com/20041125/n223169136.html>。轉引自《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臺北：中華歐亞基金會，95年），頁137-138。

30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社論），《人民日報》，2006年8月23日。轉引自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頁76。

31 麥艾文(Evan S. Medeiros)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頁76。

32 同註31，頁16。

世界」的概念在其外交策略中，正扮演著重要角色。

肆、檢視「和諧世界」的若干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

一、「和諧世界」的推動與國際制度建立的問題

中共認為推動和諧世界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新的國際秩序是要對國家政治權力的「超越」，以建立一個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社會。³³大陸學者張蘊領認為「從國際關係的視角來看，它是各國相處的一種方式，即以協商、合作而不是武斷、對抗的方式來處理相互間關係和具有相關利益的事務。」³⁴學者李鋼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引導下所建立起的世界秩序，大部分國家不會輕易放棄由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³⁵王逸舟認為「當前國際制度構成的許多要素體現了西方的制度和利益要求。」³⁶目前，中共的決策群和大部分的學者都了解西方世界所掌握的現有的國際制度，已具有絕對領先的地位。

中共若欲推動新的世界秩序，必然須面對如何要求多數西方國家拋棄既有的秩序。其次，由誰來主導新秩序的遂行。最後，如何讓主要行為者願意繳出其所制訂既有的權

力規則與現實利益，又要服從新的制度與秩序。上述問題其實是「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概念。和諧世界概念的推廣，其實是中共欲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爭食國際政治中的利益及如何提升自己地位的重要策略。中共高層更認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大陸應該重視經濟外交的價值，並具備以「軟實力」以因應崛起的「硬實力」。他們認為「全球化」發展的趨勢有助於中共從中獲益，並得以從中發揮影響力。³⁷大陸學者沈國放表示：「全球化造成的衝擊正改變世界政治和地區政治，中國正塑造著新的國家行為，也向世界各國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要求。規範全球化時代的外交思維，已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一個新課題。」³⁸全球化對中共而言是機會與限制並存的議題，中共普遍認為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大於威脅。

由上述分析得知，「和諧世界」的概念是為配合全球化國際體系變動下，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共認為全球化的國際格局已漸漸朝向「多極化」的格局，多極化的進展將使新興強權國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金磚四國」在國際舞臺上意見的表達、「二十國家集團(G20)」在國際經濟議題上的影響力，都是「多極化」格區發展的新趨勢。中共外交官員表示：「新興地區大國和區域集團加速崛起，他們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會

33 劉清才，〈超越傳統權力政治構建和諧的世界新秩序〉，載於梁守德主編，《中國與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5月），頁40-41。

34 張蘊領，〈關於構建和諧世界的思考〉，載於唐晉主編，《大國外交》（北京：華文出版社，2009年3月），頁145。

35 李鋼，〈西方國際制度理論析論〉，《世界政治與經濟》（北京：1999年12月），頁17。

36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37。

37 麥艾文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頁52。

38 沈國放，〈中國外交的理念與實踐〉，《世界知識》，2007年第13期，頁43。

不斷地加重。」³⁹所以，「和諧世界」的推動是中共因應多極化世界來臨前，進行戰略預判下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雖是國際關係的特徵，但不一定會導致無秩序的國際社會。雖然，世界不存在一個共同的政府，但是國際社會仍然存在著。⁴⁰從新自由制度主義者的觀點來看，無政府狀態是國際社會既存的事實，也同時為國家間的各種互動模式提供了合作的空間，藉由制度的建立，國家間的合作會增強，彼此間的誤解可以被消除，和諧的世界可以建立。⁴¹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紛爭》一書中區分了「和諧」與「合作」的概念。他認為「和諧」是每個行為者的能動性(agency)促進其他行為者目標的實現；「合作」是每個行為者的政策被視為在阻礙其他行為者的政策時，如果彼此間的政策是相容的，即會發生合作現象，合作是高度的政治性，合作在國際政治中是常見到的事，而和諧則是罕見的。⁴²新自由制度主義基本上認識到，要建立行為者之間彼此的合作，是基於行為者之間的互賴程度的高漲。因此，國家之間會通過制度的建立，以要求彼此間的互賴，從而去鼓勵更多的行為者參與更多的國際合作。換言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必須通過形塑與建構更多的制度(principle)、規則(rule)去創造行為者的社會資本，以解決本身

對外行動的困境。

事實上，中共推動「和諧世界」雖有部分承襲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但卻融入了中共本身的新安全觀、新的國際秩序觀與推銷一套「中國崛起」的意識形態。在新安全觀方面，中共強調通過國際合作儘可能消除恐怖主義、激進主義、金融風險並能防止核擴散等非傳統安全，以維護區域的和平及穩定。在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方面，中共會運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企圖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受利，以建立國家之間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以改變當前不公平的經濟秩序。在推銷中共崛起的意識形態方面，中共真正的企圖是要告知世人；中國的崛起並不會為區域或全球帶來威脅，以降低「中國威脅論」的傷害力度，同時也可將政經發展的經驗向全世界推銷，有利於中共對外政策的推展。換言之，和諧世界的理念不完全等同於新自由主義，在更深層面上它結合了中共的新安全觀與對外政策，是一套正在發展與實踐的概念與對外政策。

然而，中共在推展上述理念時，卻很容易引起其他大國（美國、日本）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對待，主因中共非常著重於美國權力的消長，以及美國在全球政治的角色和美「中」的關係發展所致。目前，「中」美在處理共同的戰略問題，例如北韓核武問題、南海主權爭議問題時，讓中共感到不滿。美

39 同註38，頁42。

40 Robert Axelord, and Robert L.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Kenneth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26-228.

41 參見蘇長和，〈解讀「霸權之後」—基歐漢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載於基歐漢(Robert Keohane)著，蘇長和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紛爭》（序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5。

42 基歐漢著，蘇長和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紛爭》，頁61-65。

國在國際事務的相對主導地位，讓中共決策者相當不安、積怨已久，並稱之為霸權。⁴³許多中共人士擔心美國將企圖遏制中共的經濟、外交和軍事能力的發展。中共2010年《國防白皮書》即明顯地指出：「亞太地區安全的複雜性、多變性趨於明顯。……」。亞太地區戰略格局醞釀深刻調整，相關大國增加戰略投入。美國強化亞太軍事同盟體系，加大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力度。」⁴⁴近年來，中共不斷加重軍事預算的投資，並不斷強化軍備設施，導致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選項，仍將美國介入中國的內政事務列為其最大的軍事威脅。⁴⁵此外，從中共種種的涉外行為顯示，中共對待美國（大國）的安全觀，與其對待鄰近國家（他國）的安全觀有很大的差別。中共主張更加多極化、建立民主化的國際關係、建構「和諧世界」的聲明，其實暗中在反對美國的單極政策。⁴⁶未來，中共在全球推動和諧世界的及發展國際新秩序時，美國或其他大國的阻礙必然會形成阻礙，而中共在處理大國關係上，能否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或建立共享的價值觀（制度）作為回應，抑或是仍將回歸到以現實主義的權力算計與抗衡手段，都將對和諧世

界的推動帶來新的挑戰。

二、「制度」建構參與國（行為者）自主性的問題

中共強調「和諧世界」之企圖，是為了與國際社會緊密連結，進而減緩「中國威脅論」的傷害，因而它需要更多的國家支持中共的對外行為。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來看，國際新秩序的形塑是一種過程；它必須通過各個行為者認定的「共同利益」與「共享價值」，來創造與維持國際社會的秩序。⁴⁷此外，由於國家是國際社會組成的主要成員，要使國際社會成為一種「社會」，最主要的整合力量必須依靠規則、規範與國際制度等因素，此乃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所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國際機制的世界中。」⁴⁸。然而，中共「和諧世界」的概念僅能稱之一個理念的推展；它是要擴大「多邊主義」的功能，因為對中共當局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外交論調，它需要更多的支持者（國家）參與，才能對中共綜合國力（主要指經濟）有直接的助益。尤其，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存在著各自獨立又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國家，由於處於近乎無政府狀態下，因而產生許多問題，形

43 Yong Dong, "Hegemony on the Offensiv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 Global Strate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3, 2001, pp.354-355.

44 《2010年中國的國防》，http://www.gov.cn/jrzq/2011-03/31/content_1835289.htm。

45 錢博斯(Michael R. Chambers)著，〈探索問題背景：中共的威脅環境與國際義務〉，載於《解讀共軍兵力規模》(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頁26-28。

46 2004年中共前外交部長錢其琛在中共黨校發表的演講（未公開）。錢其琛明確提到中共相當關切美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公平正義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威脅。詳見，麥艾文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頁81及第88頁註19。

4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

48 Oran Young, "International Regimes: Problem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Paul F. Diehl,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tterns and Insights* (Chicago: Dorsey Press, 1989), p.28.

成持續的「囚徒困境」。⁴⁹如何調動參與國（行為者）的自主性，以及如何克服上開國家「機會主義」與「囚徒困境」，成為建構上述「制度」的重大難題。建構主義學者魯杰(John Ruggie)認為，國際社會並非由國際制度組成的網絡，而是由各個行動體相加而成。國際社會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由各體組成的環境中，存在超越個體利益的全球公共利益，才會讓個體通過選擇和設計而產生國際制度。⁵⁰「公共利益」(common interests)與「共享價值」絕非自然存在，而是需要某個個體（通常為大國）的安排，才能創造與維持。從國際制度建立的歷史來看，制度的建立象徵著大國（或稱霸權國）的思想與計畫已受組織內多數國家的支持。目前國際秩序是二戰後由美國及西方國家設計的思想與架構，渠等國家當然不願意更改原有的國際秩序。是故，中共欲建構國際新秩序（和諧世界），必須先能說服參與者的意願，同時要能提供建立國際秩序的資源與架構（或稱之為「公共財」⁵¹），爾後才能讓各個行動願意接受他的安排（或稱之為「搭便車」⁵²）。

中共了解必須先在國際社會提供足夠的利益、參與多邊的論壇，才可以形塑國際規則、增進周邊國家的關係，進而形成新的

國際秩序。所以，從1990年代起中共的「睦鄰友好政策」對鄰近國家提供了各項經濟優惠政策，並擴大在東南亞的合作範圍，以期能在該地區建立區域的經濟與安全制度。目前，中共已經參與所有重要的東亞區域組織，包括東協區域論壇、亞太經合會、東協加一（中共）、東協加三（中共、南韓和日本）和在東亞地區每年舉行的高峰會。⁵³在中亞地區，中共更是提供了政治、經濟（石油）與地緣安全等項的優惠政策，以使中亞國家與中共建構了緊密的雙邊合作關係，中共也擴大和發展出多邊形式的「上海合作組織」，並在其中扮演大國的主導地位。⁵⁴在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中共更是發揮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全力發展主權和多邊主義的外交，已引起上開地區國家的共鳴，因這些國家與中共建立合作關係，可以讓他們獲得外交和經濟力量，進而提升國家地位。⁵⁵

大致歸納，中共近20年來之所以能逐漸建立起大國的地位，主要依靠以下四個優勢條件：(一)具有吸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多認為中共的發展模式（所謂以「北京共識」取代「華府共識」）是值得模仿與學習；⁵⁶(二)提供優惠的經濟利益（援助）。在拉、非與亞洲周邊地區國家，都

49 大衛·鮑德溫主編，肖歡容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頁85-86。

50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8-140.

51 所謂「公共財」(public good)是指在一個群體之中，每個行動體都可以享有他是否有所貢獻的福利，例如各種社會福利、公共設施等。

52 所謂「搭便車」(free ride problem)乃指群體中每個人都希望群體能提供各項公共福利和設施，而自己在其中可以享有該些福利，而不需作任何的貢獻或受到任何限制。

53 麥艾文著，國防部譯，《中共的國際行為》(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頁152。

54 同註53，頁154-162。

55 同註53，頁167-178。

56 同註55，頁98。

已獲得實質的經濟與安全利益；(三)在「轉型正義」方面，許多落後地區國家認為，藉由與中共合作可以對抗長期以美國為主西方國家的剝削；(四)可實施「臨時性」的合作對象。在經濟發展模式方面，提供優惠經濟援助上，而在「臨時性」的合作目標方面，主要針對世界大國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同創造彼此的利益，例如中俄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中的雙（多）邊合作事項、中美之間因非傳統安全所採取的合作關係等。

然而，中共因本身仍為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他的各項作為仍受到多數大國的質疑，甚至認為「中國威脅論」仍將造成未來國際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共於2003-2004年先後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戰略，正是針對中共已意識到這種安全困境變動，故而必須藉由安全保證來化解區域國家的憂慮。⁵⁷由此得知，建立「和諧世界」若視為一種「制度」的建立，中共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推動參與者的自主性。制度的形成並非僅憑國與國之間互動即可形成，它必須依靠大國提供足夠的優惠條件，並能讓追隨國安心及願意貢獻出其追隨的意願，制度才可能形塑。

三、建構和諧世界的「自利」與「信任」問題

中共欲建構和諧世界（國際新秩序），其所面臨的第二個難題，為如何克服單一國家的「自利」與國家之間的「信任」問題。

大陸學者閻學通認為國際關係體系無論是單極或多極之間的零和博弈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國家仍會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國際政治矛盾是大國間的戰略矛盾，是美國霸權與大國反霸權之間的衝突。⁵⁸美國經濟學家歐爾森(M. Olson)把個體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觀念運用到集體行動上，他認為除非群體的成員很少，或者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利益的手段，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是不會採取行動以實現他們的共同或集體利益。⁵⁹

國內學者李英明認為，「多極化」國際社會中的權力展現必須通過各個國家（行動體）之間的對話、合作，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⁶⁰上述概念符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主張；世界政治應建立多層次、多中心的制度，才能建構有別於國內政治的秩序。然而，國際組織的公共權力與國內公共權力最大的差別，在於國家會以「利益」／「害處」（趨利避害）作為「理性選擇」的思考標準。個體的理性思考與集體的理性思考不盡相同，國家（個體）通常會以自利的立場，思考應如何在整體的國際結構中，獲取國家最大的利益。相對的，國際組織（社會）又會以集體理性的方式要求行為體遵守制度的規定。所以，制度的展現實際上必須先通過行為體之間的算計，嗣後才會產生信任。國際制度的產生是為尋求和運作彼此間共享的價值觀與信任度，以使每個國家在

57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 Vol.8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18-24.

58 閻學通，《美國稱霸與中國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1-22。

59 曼庫爾·歐爾森(Mancur Olson)著，陳郁等譯，《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版），頁2。

60 李英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臺北：揚智出版社，2004年7月），頁68-69。

遂行個體的「理性選擇」之時，願意遵守制度。合理推論，若制度（集體理性）無法滿足國家（個體理性）的需求，制度即無法產生其應有的效益。

舉例而論，中共在最近十年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非常頻繁，企圖在此區域內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以獲取安全保證和防止圍堵。事實上，從1990年代起即積極參與東協的貿易活動，並藉由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挹注與東協國家的投資與合作方面。中國與東協的貿易量大幅增加，其進口量從1997年的120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近895億美元，中國出口到東協的數量也在同時期從近130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710億美元。⁶¹中共在該地區的投資額度也從1996年的3億美元，到2007年增加到39億。⁶²中共與東協國家密切的結合，也使東南亞區域外的國家倍感壓力，所以不斷有「東協十加一」、「東協十加三」、「東協與印度」、「東協與紐澳」，都是因區域的整合而擴溢到更大地區的整合效果。藉由東協組織中共已經解決許多邊境爭議，擱置其他陸地與海洋領土衝突。此外，「睦鄰」外交政策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外交重點工作之一，中共十六大以後，甚至於將睦鄰工作視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面向。⁶³2003年10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首屆東協高

峰會議上提出把「睦鄰、安鄰、富鄰」作為中國大陸實現自我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⁶⁴中共了解必須將自己融入到地區的組織與社會之中，才能從中獲取安全保證及在區域中的影響力。

然而，中共與東協國家建構的雙邊與多邊關係，並不能保證必然會讓上開國家願意與遵守所建立的合作關係（制度理性）。例如，近半年（2011年）來在南海地區所發生的主權爭議問題，南海情勢又因各主權國因幾起事件而激化彼此間的對立，各國劍拔弩張，大肆擴張軍備，戰爭情勢似乎一觸即發。⁶⁵越南與菲律賓因軍事力量不足以與中共抗衡，轉而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甚至與美軍進行聯合軍演，以嚇阻中共在此地區的強勢作風。⁶⁶美國雖不屬南海地區的周邊國家，但因牽涉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因而願與越、菲等國合作共同對抗中共。很明顯的，各國之間為了自己的「私利」，似乎忘了區域中既存的規章、原則與制度。南海主權爭端突顯了中共與東協國家的利益矛盾，更彰顯了小國（越南、菲律賓）當面臨「安全困境」時，不惜違背區域既有的制度（東協論壇、東協十加一區域組織），而去尋找另一個大國以謀求聯盟（軍演），共同對抗原制度內的大國（中共）。所以，整體

61 江敏華，〈從東協經濟整合看中國的區域戰略〉，前引文，頁35。

62 《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8年，頁12。

63 〈胡錦濤：共建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人民日報》（北京），2003年6月6日，版1。

64 〈溫家寶總理在東盟商業與投資峰會上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北京），<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dqcdmeyzrhld/t27173.htm>（檢索日期：2003年10月10日）。

65 地緣戰略上，南海因處於太平洋通往印度洋之要衝屬戰略要地外，也蘊藏豐富石油，因此我國、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共及越南都曾因主權領土起過爭端。詳見，張中勇，〈中共對南海紛爭的衝突策略〉，《警學叢刊》（臺北），第27卷第2期，民85年9月，頁144。

66 〈美籲「中」與周邊國家展開對話〉，《青年日報》，民100年6月27日，版5。

的理性（制度理性）選擇實際上並無法克服個體理性的「囚徒困境」與「搭便車」（個體理性）的心理。是故，中共欲建構「和諧世界」，須先致力克服單一國家的個體理性，同時也要設法擴大和諧世界（集體理性）應具有的共享價值觀與信任度，否則，類似南海主權的爭端仍將重演。

伍、結 論

本文研究發現，「和諧世界」的建構是中共大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對外關係上要確立中共新的安全觀，主張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強化以溝通、開放及對話的新機制。中共採取方式是運用自己的政、經實力，廣泛利用現有的國際體制、創造周邊國家的和諧環境，以及營造有利於己的意識形態。另外，建構「和諧世界」的目標不是為了建立制衡的聯盟或推動經濟發展的大國（霸權）秩序，而是要營建有利於中共自身利益發展的外在環境。所以，從中共外交領域而論，「和諧世界」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手段，是達到其國家利益的目標，是要推銷一套中國式（國際關係理論）的意識形態。

其次，「和諧世界」的概念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雖有多處相通，實際上它是中共「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延伸。和平共處五原則是中共依據各個不同時期的外在安全環境及國家生存發展的對外方針。尤其，它是針對冷戰後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觀念不斷抬頭下，提出的重要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共近十年來的國際行為來看，「和諧世界」理念的提出是要配合國際「多極化」的新局勢，建立一個無中心（霸權）的國際新秩序。不可否認，它有部分沿襲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模型；欲建立互利、互信、平

等、公正的新「國際制度」的架構。「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為80年代的產物，在國際關係史上它已被全球學者檢驗了近30年，但仍有諸多之處有待後續的研究與發展。「和諧世界」引用多項「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當然會受該理論不足之影響。

然而，隨著中共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下，「和諧世界」的理念將在外交、經濟與軍事各領域的作為中，擴大中共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亦將對整體亞太區域安全環境造成影響。中共的企圖是想超越長久以來一直由美國主導的「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和「文明衝突論」的零和思維模式，更要凸顯它是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典範。

收件：100年11月16日

修正：101年04月24日

接受：101年04月25日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陸軍官校72年班、巴拉圭三軍指參學院1993年班、陸院85年班、戰院87年班、戰研所92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法學碩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戰略研究、社會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